

第1章 暴富时代 喜剧化的开场

虽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再现的神话时代，但这也是中国股民最兴奋也最难忘的时代。回忆一下当年见股就买、买股必赚的情形，也足以让人心跳加快、血压升高——

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里，在上海，延中实业由每股 100 元涨到了 1 599 元，豫园股票由 100 元涨到了 3 580 元最后竟突破万元大关，让人大跌眼镜；在深圳更是邪乎：深圳发展股票面值 1 元，黑市售价高达 150 元，其它的则有的涨了 50 倍，有的涨了 100 倍，最少的也涨了 20 倍……

几年前还需要摊派需要党员干部带头购买的股票，成了中国最火爆的东西！

中国有这样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一对赤贫如洗的农民夫妻在耕地的时候意外地掘出了一只聚宝盆，他们往盆里放进一把米就可以取出 10 把米来；放进一只金元宝，旋即就能取出 10 只金元宝……

以想象力丰富著称的中国先人，在财富积累的想象上，却是这样的贫乏。他们充满着致富欲望的大脑杜撰出来的神话，竟不过是幻想有个能给他们带来 10 倍回报的聚宝盆。如果告诉他们，现实生活里还有比聚宝盆更神奇的东西，它带来的回报不是 10 倍，而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我想借一千个胆子给

他们也难以让他们相信。他们宁愿相信天庭之上有玉皇大帝的存在，也不敢相信现实生活中会有如此高速的财富增长。

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创造这一人间奇迹的不是神灵恩赐的聚宝盆，而是曾经被我们丑化、诅咒并且抛弃的股市！

时光倒回去 10 年多，虽然全球股市热闹得不可开交，但对于已经步入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人说，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股票一说。少数年纪大些的人（习惯上被称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或许还依稀记得大上海曾搞过那玩艺儿。据说那里是“冒险家的乐园”，是“高级疯人院”。一些电影电视要描绘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总要设计一些头戴礼帽、身着西服、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的资本家们尔虞我诈地搞股票交易的镜头。而新中国诞生后出生的中国人，绝大部分还是从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和曹禺先生的剧作《日出》之中见到过“股票”这两个字。也正是这些作品形象生动的描绘，股票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的惟一印象，便是充满了铜臭和邪恶的东西，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可怕游戏。

改变中国人观念的，不是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说教，不是报刊电视的轰炸式宣传，也不是市长市委书记的亲自带头买股，更不是行政命令的强行摊派，而是股票的“赚钱效应”。从 1987 年到 1992 年的 5 年时间里，不管是自愿的还是摊派的，也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凡属买了股票的无一例外地赚了，并且还不是一般地赚，而是十倍百倍地赚。许多人迷迷糊糊地赚了几十万，许多人懵懵懂懂地成了百万富翁。股票，已经不是我们的祖辈们幻想过的聚宝盆，而成了印钞机。只要你将几千几万元投入进去，十天半月后一觉醒来，这个印钞机就可能给你印出了几十万几百万元。因此，据说火爆的时候，深圳的纤维袋甚至麻袋都特别走俏——人们拿来不是装物，而是装钱！

这不是夸张。凡在 1987 年或 1988 年购买了 2 500 元发展股

的投资者，只要抱股惜售，在 1990 年 10 月 24 日，发展股面值由 1 元升至 58.71 元市值时抛出，就可成为拥有 14 万元的小康。而一些专事投机的股市操纵者，在经过多次低吸高抛后，同样是 2 500 元的发展股，或 2.5 万元的安达股，或 1990 年 3 月的原野股 2.5 万元，就可加入 50 万元的中产阶级。若在最高价位抛出，则赚得更多。如果你 1987 年咬着牙根买的是 1 万元的深发展，经过历次分红扩股，在 1990 年高峰时没有抛出，到 1992 年，你便成了名符其实的百万富翁——1 万元变成了 100 万元。若是你此时还是不抛，一直持股到现在不动，且每次配股都参加，那么到现在其市值是多少呢？有人计算，到 1999 年底，倘若将每年的派息款忽略不计，或者视作与参与配股所投入的资金作冲抵，仅以送红股和配股、拆细计算，1987 年买入的 500 股（面值为每股 20 元），如今已发展到 111 余万股，只以低潮时的每股 20 元计算，则市值为 2 220 万元，增长 222 倍！如果你在 1988 年花 1 万元购买了 100 股（每股 100 元）豫园商场股票，至 1992 年 7 月，你便拥有了 100 万元。仅仅是 5 年时间，你就能让自己的资本翻一百倍，什么样的聚宝盆有这样的神通？

美国一名知名社会学家沙普林博士指出：“自从诞生商品经济社会以来，给予人们致富的机遇先后有三次：第一次是贸易与商业，第二次是高科技开发，第三次是股票金融。这三次机遇各自历时 10 年上下，每次机遇来临都能诞生一批大富翁和事业家，如果有准备，只要在机遇来临时去积极参与都会有较大的作为。而在机遇之后的任何才子，如果不是继承先辈的事业，则很有可能做这些富翁和事业家的雇员，而靠工资吃饭。”

中国的改革，是要把西方几百年发展经济的过程，在短时期内走完，因此经济机遇间隔的时间更短，经历的时间也不长。抓住了机遇或是无意中碰上了机遇的，便迅速暴富起来，而随后蜂拥而至的，固然还有致富的机会，却难有暴富的可能。80 年代

初，个体经济开始发展，当初所有积极参与的人现在都加入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行列。有些人是稀里糊涂地富起来的，还有极少部分劳改释放人员，没有正式工作，只好走个体经济之路，结果被“逼迫”上了富裕之路，那些有头脑、有预见力、有胆量的人，今天则成了几十万元户、几百万元户甚至几千万元户，而 80 年代中后期起家的，则很难有起色。

与历次机遇相比，新诞生的股市给人们带来的机遇更加巨大，也更加突然，结果许多人再一次在机遇面前麻木了：有的人把股票视为骗人之物而敬而远之；有的人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买上两股尝尝；有的人在股市诞生几年之后尚不知有股票存在……结果市长不得不带头买，机关干部不得不摊派买，有的地方还不得不带有一点强迫性质的买。滑稽的是，几年后，无论是带头买的、摊派买的还是强迫买的，无论是有意买的还是稀里糊涂买的，统统发了大财成了富翁。有位木工，祖辈到他这儿从没有拿过大钱，一时冲动拿出所有的积蓄共 6 000 元，买了 300 张发展股票。两年后，到股票交易厅一卖，服务员从窗口推出一大堆钱，他只好找来一个大塑料袋装上，飞一般往家跑，回家一数，足足 15 万元，然后仰天大笑，竟然疯了！见人就讲，股票！发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挣的这点钱是小巫见大巫，没过一个月，黑市上股价涨到了 150 多元，他的 300 张股票，可卖到四五十万元。有位老太太到银行存钱，正好该银行在发售股票，结果她排错了队，稀里糊涂地把 1 万元钱“存”进了股市，回来后也还不知道，一直把股票当作储蓄单压在箱底。3 年后，她以为存款到期了，来到银行取款，取回的竟是 80 多万元，把老太太差点吓晕过去：是自己老糊涂了还是营业员搞糊涂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暴发户”，股票这个词从陌生变为熟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欢迎它的出现。许多人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聚宝盆。于是，只要一有股票出来，就有数以百

万计的人竞相去买，热闹的时候，深圳市竟有 60 万股民没有地方住宿而露宿街头；买不到原始股，就到二级市场去买，不管你开多高的价，总有人买。面值 100 元的豫园股票，1 万元一股也有人要。有的炒股炒成了百万元户，有人炒成了千万元户。武汉大学一文科教授，最初只投了 5 000 元，3 年功夫，炒出了 150 万元。而他的一位朋友，拥有股票市值达 2 000 多万元。说股票市场是现代的“聚宝盆”，不是言过其实，而是言犹不足。

这是中国股市发展史上的神话时代，也是中国股民的暴富时代。时间是从新中国股票的诞生到 1992 年 8 月。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次资本裂变的过程，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股市有过如此迅猛的资本裂变阶段，未来的中国股民大概也不可能再有如此普遍暴富的时候。

历史不能复制，但可以研究。虽然经济学家们现在尽可以说当时的股市是如何的不完善，当时的股民是如何的不成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股市正是以第一批股民的暴富而吸引人们的目的。无论是最初的 40 万幸运股民还是现在的 4 500 多万亏多赢少的股民，在中国股市走过 10 年风风雨雨的时候，重温当年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追寻中国股市诞生之初那歪歪斜斜的足迹，对于把握中国股市的发展方向，捕捉中国股市的致富机遇，都不无启示意义。

一、股票，重新叩开中国的大门

百年坎坷 夭折的旧中国股市

1949 年 6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查封命令，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上海市公安局、华东警卫旅率部队及

部分便衣警察 200 余人，包围了位于上海汉口路 422 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5 个行动组封锁了这幢 9 层大楼每个出入口。场内银元交易者被告知停止买卖，不准外出，也不允许打电话，随后接受登记审查和盘问。被认为情节较轻的 300 余人很快予以开释，另外 238 人被扣押。6 月 12 日，上海地方法院对此进行了审判。其后，证券大楼即由华东警卫旅驻守。

数月之前，这里还是一派交投活跃的景象，234 家企业证券在此登记交易，是远东最大的交易所。5 月 27 日以后，这幢大楼成了银元投机分子的指挥中枢。为了确保人民币地位的稳固，中共华东局决定采取断然措施。6 月 8 日查封证券大楼的决定上报中央，毛泽东收悉电文并亲自批示；9 日，查封命令签发下达；10 日便完成了查封证券大楼、取缔证券市场的任务。

——畸形发展、弊端丛生的旧中国证券市场由此宣告消亡。

股票作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物产物，已经有了 400 多年的历史。而股份经济的历史更长，最早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在古罗马时代，由包税人组织的股份委托公司和委员会制度，便被经济学家认为是现代公司的先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单家独户生产已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于是人们就开始把各自的生产资料聚集起来，合伙经营，这便是股份经济的最初形态。早在 1553 年，英国的莫斯科尔公司为建造几艘巨轮以开辟一条通往远东的海上之路，便以每股 25 英镑的价格，发行了 6 000 英镑的股票。据经济学家们研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发行的股票。进入 17 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完善，出现了以股份公司为主体的股份经济基础。1600 年 12 月 30 日，由欧洲霸主荷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较规范的股份公司。该公司在全国公开集资，入股者既有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商人，也有一般平民，资本总额达 650 万荷兰盾，主要经营海外贸易和开拓殖民地。1694 年，作为资本主

义最早的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其准备金就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

18 世纪 7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较快较大的发展，国际贸易大幅度增加，市场空前开阔，社会生产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单个乃至几十个私人资本，已经适应不了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于是，以资本入股或以发行和认购股票的形式组成的股份公司便迅速发展起来。合众美国银行是美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它是通过发行每股 400 美元的 25 000 股股票筹集准备金建立起来的。1843 年，德国也以同样的方式建立了沙夫豪森联合银行。19 世纪 30 年代的 10 年时间里，英格兰的合伙银行减少了 50%，而股份银行增加了 4 倍多，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合伙银行。与此同时，英美等国掀起了修运河、建铁路、大兴交通运输业的热潮，由于这些工程耗资巨大，股份公司更是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用马克思的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没有谁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鞭挞得更加汪洋恣肆了。在他的眼里，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资本又如晨光在他的瞳孔里注入一个鲜活而又充满诱惑力的世界。他一再强调“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它所刺激起来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勤劳”，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使“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在资本主义内部日益成熟……”

随着股份公司的陆续成立和股票发行的越来越多，股票交易也逐渐走上规范化的道路。18 世纪 60 年代末，伦敦 150 名经纪人在一家名叫“乔纳森”的咖啡馆开办了一家股票营业厅，

1773 年改名为股票交易所，这就是目前欧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1792 年，24 名纽约拍卖商聚集在华尔街一棵梧桐树下，制定了他们与公众及相互之间交易的规则，并约定了每星期的交易时间，从而形成了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雏形。交易所的出现，不仅为股票的发行和交易提供了方便，而且促进了股份公司的规范化发展，形成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的资本市场。从 19 世纪后，西方各国开始陆续出现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主要是民营性的实业公司，与政治完全脱钩，尤其是近代股份公司确立了有限责任原则和法人支配财产原则，并建立了规范化的股份制，使股票具有自由让渡性，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在英国，19 世纪后半叶股份公司迅猛发展，1862~1886 年新设立的公司为 25 000 家，平均每年设立 1 041 家，而 1900 年一年新设立的公司就有 49 676 家。在美国，到 19 世纪 80~90 年代，各种工业股份公司达 38 770 家；20 世纪初，拥有资产在 1 亿美元以上的工业股份公司已有近 100 家。进入 20 世纪后，在近代股份制的基础上，股份公司不断完善，并越来越成为企业组织的主导形式，成为左右西方国家经济的基本力量。

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股份经济和股票交易，中国整整落后了 300 年。在中国，证券这个名词是清朝末年从日文中引用过来的，而股票在中国的出现大约在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从而也把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多年的集股筹资的作法带入了中国。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外国的一些商行开始在华大量发行股票。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后，华资企业也开始发股筹资，其中最早发行股票的是 1873 年由李鸿章、盛宣怀筹办的轮船招商总局。后来又陆续有中兴煤矿公司、汉冶萍钢铁厂矿公司等股票的发行。1897 年 5 月 27 日，旧中国成立了第一家自办的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8 年 2 月 4 日，

旧中国首次发行公债——“昭信股票”，发行总额为 10 000 两，分 20 年还清，但是绅民购买者寥寥无几，不久即被停办。1905 年 8 月，又一家带有股份性质的银行——户部银行成立，该行属官商合股兴办，注册资本 400 万两。另外，在航运业、工矿业、纺织业也大量出现了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股份制企业，如 1872 年的轮船招商局，1878 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75 年开平矿务局、1895 年的大生纱厂等。

在出现股票和债券的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证券买卖活动。1882 年 10 月，华商兴办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国内第一家股票交易机构。1891 年在上海经营外商股票的经纪人组织了“上海股份公所”，1905 年在香港地区注册登记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1914 年正式组成“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为中国第一家正式的证券组织。同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证券交易开始走上正轨。1916 年，由孙中山先生倡议与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 年 7 月 1 日获得批准开业，集资 500 万元，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集资 300 万元，经纪人 55 名，经营对象主要是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北洋政府先后还于 1918 年、1921 年批准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买卖，盛极一时。其后，在战乱不断、经济凋零的情况下，旧中国的证券市场畸形发展，成为冒险家投机的乐园和统治者搜刮民财的场所。投机倒把、造谣欺骗的事件时有发生。1908 年，有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开设橡皮股票公司，发行股票集资，宣称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胶树林。当时外商银行也与之相勾结，开办承做以该股票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因此，许多人争相购买橡胶股票，有些钱庄认为有利可图，也参与哄抬橡胶股票价格的活动，收购橡胶股票。1910 年，橡皮股票公司的外国

人，将股票全部脱手售出，携款逃回本国。外商银行也宣布停止承授该股票的抵押放款，并催索以前的押款。持票人才知上当受骗，钱庄因资金周转不灵，相继倒闭的有 12 家，形成一场有名的橡皮股票风潮。

从清朝末年证券和证券市场的出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具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都是先有外国的，然后才在国内发行，而且发行股票的企业大多与清政府的大官僚有关，不是官商合办就是官商督办，他们利用职权操纵了企业的大权。发行的债券也是财政公债，不是为了偿还外债就是为了镇压农民运动，加重了对广大商民的经济勒索。并且，当时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客观条件也并不完全具备。清朝末年近代工业刚刚兴起，而且主要是官办或是官商合办的军事工业和少数与其有关的工矿企业，商品经济还不发达。股票的发行多属认购，债券发行也是强行推销，经营证券买卖的交易所适应游资集中于大城市的时势，多是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生意，起不到集聚社会游资发展经济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旧中国的证券和证券市场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畸形儿。全国解放后，为了打击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行为，国家关闭了旧的证券市场。从此，发展不足百年的旧中国证券市场宣告夭折。

新中国与股市握手

1986 年 11 月，华尔街上的巨头、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执行主席约翰·凡尔霖先生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11 月 4 日，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华尔街的金融巨子。约翰·凡尔霖赠给邓小平一枚精美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徽章，说佩戴它可在戒备森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畅行无阻。听罢，邓小平笑了。他回赠了一张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证券交易部代理发行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

司的股票——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凡尔霖收下了这一特殊礼物。

随后，在上海国际金融研讨会闭幕式上，中方将 16 张上海电真空公司股票作为特殊礼物，赠送给了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前国防部长、美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等 16 位外国代表，连同凡尔霖先生的股票，上海已有了 17 位洋股东。

这不仅仅是一种礼遇，而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金融革命。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忽略了这个细节，倒是敏感的洋人意识到，中国，马上就要开放股票市场了。一时间，外电惊呼：“中国与股市握手！”

鲜为人知的是，解放初期，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关闭了旧的证券市场的同时，为了迅速恢复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疏导社会游资，曾经筹建过证券市场，但可惜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当时，天津市军管会决定成立证券交易所，经过短期的筹备，1949 年 6 月 11 日在已经解放的天津正式开业。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比共和国的诞生早了 4 个月。当天上市的 5 只股票中，有 47 年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耀华玻璃。此后，北京市也于 1950 年 2 月 1 日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随着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股票作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一种媒介自然就逐渐消亡，证券中股票越来越少，作为产业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场所已无存在的必要，所以 1952 年 2 月和 7 月，国家先后关闭了北京及天津两个证券交易所，至此，股票在中国大陆绝迹。

在此之后很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货色，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是要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剥削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商品和商品交换，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应当予以割除，至于

股份制、股份经济、股票和股票市场，更是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被拒之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因此，股票彻底退出了中国经济舞台，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大多数人认为，在新中国最早提出搞股票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他后来被称为“厉股份”。1980年4月，国家劳动人事部召开“劳动工资座谈会”，主要想解决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就业问题。厉以宁在会上提出，只有振兴中国经济，才能系统解决就业问题，并提出采用股份制方式扩大老厂规模、筹建新厂，也允许知识青年带股进厂，以此增加就业。当时与会的许多知名学者、权威人士对厉以宁的说法甚感吃惊。后来，厉以宁又向李鹏建议用“金、木、水、火、土”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其中“火”是指工厂冒烟、实行股份制。

1981年，财政部在全国发行国库券。从此，“内无内债、外无外债”成为历史。

1984年，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其中，《江汉论坛》开辟了“社会主义能否发行股票”专栏，在舆论上为后来的股份制改革作了准备。

1986年5月，国务院在批准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单位的《关于1986年商业体制改革几个问题报告的通知》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了“股份制”这个词。别看仅这3个字，却是字字千钧，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股份制一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滋生剥削与压迫的土壤。虽然经济界有过反复的讨论，认为股份制只是一种经济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实践中也有过多次的尝试，并且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从来还没有在政府文件中得到过明确的肯定，包括正式使用这个词语。此次公开使用“股份制”这个词，显然意味着党中央、国务院开始重新认识股份制，并有意借鉴股份制。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股份制作了明确的肯定：“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试行。”

但是，在以后一段时期里对中国应不应该发展证券市场仍有很大争论。有些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引入资本主义制度。针对这种争论，199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上海证券交易所，他那铿锵有力的话，无疑是一缕春风，拂过波澜不兴的股市。随后，邓小平南巡，再次清楚明确地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允许看”，是对那些持怀疑态度或反对者说的，“坚决试”，是对支持者说的。他把证券市场看作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他的讲话极大地激励了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成立，证券市场正式纳入国务院管理范畴。

从1992年开始，股份制经济在中国得到了最迅猛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企业的一项基本形式。虽然后来围绕股份制的性质又出现了姓“社”与姓“资”、姓“公”与姓“私”的激烈争论，但股份制经济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一锤定音，给股份制正式定性：“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

种资本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其实，就在理论界还在激烈地争论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搞股票交易的时候，企业界却开始了大胆的尝试。股份制经济在中国悄悄萌芽，股票也在中国悄然出现。

也正因为当时这种悄悄的尝试，以至于现在对于新中国的第一只股票到底是由谁发行的，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建国以来的首张股票是由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980年7月，经成都市政府批准，蜀都公司的前身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按面值向全国及集体所有制单位发行股票。至1986年底，蜀都公司共募集到国家股980万元，法人股1421万元。另一种说法认为新中国的第一张股票由深圳市宝安公司发行。1983年7月，深圳市宝安公司为筹集宝安新县城的建设资金，向社会公开募股。宝安公司为此专门制定并颁布了公司的章程，7月25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了《招股公告》，印制了股金证。宝安公司通过这次募股行动共筹集资金1300万元，其中国家股（宝安县财政局认购）200万元，法人股160万元，个人股940万元。有人认为，宝安公司是新中国首例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全国招股筹资的公司，只是由于宝安公司当时的公司章程中规定：“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并由宝安县财政局为股东退股进行担保，这些作法都是为了使募股计划能够顺利实现，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却使定安公司这次发行的股票蒙上了很浓的债券色彩。

迄今为止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张股票。1984年8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全国第一个《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办法》共分8条，其中有这样一些内容：“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城镇职工、居民、农村社员和侨眷等可以购个人股，

股息相当于一年期储蓄存款”、“股票持有者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根据此办法，1984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发起设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飞乐音响公司在设立之初的总股本为一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市民的投资意识比较强，所以飞乐音响股票的发行工作非常顺利。发行当天，凌晨3时就有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门前排起了长队。仅用6个小时，32.5万元的股票就发售一空。飞乐音响公司这次发行的股票没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转让。因此可以说飞乐音响股票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只比较规范的股票。

也有人认为，新中国的第一只股票，是1984年7月成立的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但该股票5年还本，分红付息。因此，这似乎更像是债券，最多也只能算是“准股票”。

星移斗转，岁月更替，晃眼过去了十多年，到1999年12月30日，新生的中国股市上已经有了1029只股票，流通市值达8214亿元。虽然我们现在已难以分清是谁发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只股票，但所有在10年前进行过股份制经济探索的企业和个人，无疑都是新中国股市的开拓者，值得我们举手加额，深情致意！

梅开二度：股市再立黄浦江畔

商品存在的基础是市场 股票存在的基础是股市 因此 西方国家一般都把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作为股市的起始。1773年伦敦的“乔纳森”咖啡馆、1792年纽约华尔街的梧桐树，便分别以伦敦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永彪史册。依此而论，拉开中国股市大幕的，便是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开业之锣。

这天，500 多名中外金融界人士相聚曾经是远东最大金融中心的上海，参加黄浦江畔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作开业致词后，上午 11 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人庄重地揭开了覆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牌匾上的大红绸布，宣告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正式对外营业，也宣告中断了 40 年的中国股市重新启航！随之，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由董事长李祥瑞授权，敲响了第一声锣响，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始交易。当天有 30 种证券上市，其中有 8 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

孕育了 10 年时间的中国股市，终于在这天一朝分娩。清脆的锣声告知天下，新中国的证券业，在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复苏，重新崛起！经历了其中无数酸甜苦辣的尉文渊先生，不知是太累还是太激动，放下锣槌后竟晕倒在交易所的大厅！

走过了多少坎坎坷坷，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中国终于拉开了证券市场的帷幕！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有了规范化的证券交易场所，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了自己的资本市场。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投资理念，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潮，曾经把生产发展和人们生活必需的商品交换都排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被认为“最齷齪最下流最恐怖”的股票交易和股票市场，自然更是没有立足之地。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但唯有股市仍然被排除在国门之外。甚至在股票已悄悄诞生后几年时间，中国仍一直没有股票交易的场所，以致形成“有股无市”的现象。

最早打破横在资本市场面前的坚冰的，是一些债券交易市场，这可以算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证券市场。

1981 年起，我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同时全国各地的许多企业为筹集生产资金也纷纷发行企业债券。债券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必然要求有相应的交易市场。1986 年 8 月 5 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主办的沈阳证券市场正式开业，这是新中国的首家证券交易场所。沈阳证券市场的建立是沈阳市政府为促进债券一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采取的一项措施。1985 年 1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沈阳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沈阳市随即开放了一级资金市场，即债券发行市场。其后不久，全市就有 30 多家企业，先后通过银行向社会发行了近 3 亿元债券。这一大笔沉淀在民间的资金集中起来以后，解决了企业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社会上没有二级资金市场，使持券人的应急变现出现障碍。这种状况既限制了债券职能的发挥，也不利于今后债券的发行。在此情况下，沈阳证券市场便应运而生。

紧随沈阳之后，西安、太原、武汉、郑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证券市场。由于这些证券市场只能交易债券，不能交易股票，所以这些市场随后的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真正在日后演变为全国性证券市场的是上海、深圳两个能进行股票交易的证券市场。

上海市自 1984 年底由飞乐音响公司率先公开发行股票之后不久，延中实业及爱使电子两家公司也同时于 1985 年 1 月公开发行了股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几只股票先后发行，一个现实的问题很快摆在了第一批股票购买者的面前，遇有出国、离婚、装修房子、生病住院等情况，需要将股票变现或分割却找不到地方交易。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报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第 7 条中规定“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于是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到经手发行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股票的上海市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打听股票好不好转让？怎样转让？

1986 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增加上海市作为股份制